

# 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及其实质

刘正江

(新疆大学 语言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中唐以后,回鹘发展成为唐北部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与唐朝的百年密切交往中,马绢贸易是双方经济、政治往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贸易的长期维持涉及到回鹘与唐朝双方的根本利益。唐与回鹘进行绢马贸易是唐王朝执行羁縻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

**关 键 词:** 回鹘; 唐; 马绢贸易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11)02-0074-05

唐与回鹘汗国的关系,在唐朝民族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册封、和亲和马绢贸易方面。其中马绢贸易不仅对回鹘汗国经济,而且对其政治、社会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 一、回鹘与唐马绢贸易基本情况

### (一) 马绢贸易开展较早,中唐以后逐步扩大

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受突厥人影响。早在突厥汗国时期,“在突厥人向中国提供的商品中,马匹是最受中国人青睐的商品,至于其他国家,则是突厥武器和中国丝绸。突厥人主要向中国输出马匹以及少量的骆驼和羊,中国人以成匹的丝绸来换取马匹,对汉人而言,此乃外贸中最古老也是最宝贵的货币形式。”<sup>[1]</sup>回鹘汗国取代突厥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形式。在“安史之乱”前是以朝贡回赐贸易形式展开,规模较小。“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形式陡然转变,除了朝贡回赐贸易外,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多地通过新开的马绢贸易表现出来。在安史之乱中,回鹘兵助唐收复长安、洛阳,战功卓著。为了报答酬谢回鹘,唐朝除维持原有朝贡回赐外,新增两条措施以加强同回鹘的经贸往来,即每岁赠绢十万匹、约定开通马绢互市。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一直持续到回鹘汗国破灭。

### (二) 马绢贸易次数频繁,每次交易数量巨大

当时东罗马的丝绸价格比中国高出百倍。回鹘贵族和商人为了将丝绸转销西亚和欧洲牟取暴利,大量向唐朝出口马匹换取绢帛。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次数一年中不止一次。以公元815年为例,“八月,以绢十万匹偿回鹘之马值。”<sup>[2]</sup>“十二月,以绢九万七千匹偿回鹘马值。”<sup>[2]</sup>元和十年这一年就有两次交易。一年更多次数的马绢贸易也是常见的。例如:公元822年2月,“赐回鹘马价绢五万匹。”<sup>[3]</sup><sup>5212</sup>“三月,又赐马价绢七万匹。”<sup>[5]</sup>“十二月,以绢八万匹,偿回鹘马值。”<sup>[2]</sup>每次交易额没有固定的数量,或多或少,这都取决于回纥所交易的马匹数量。唐所付出的马价绢从几万匹到几十万匹不等。文献中记载唐朝付给马价绢数量最多一次是:公元827年,“赐马值绢五十万。”<sup>[4]</sup><sup>6130</sup>同样是在这一年,唐朝分三次付给回鹘马价绢达到了96万匹,是历年来所付给马价绢最多的年份。

### (三) 马绢贸易不仅有官方贸易而且还有私人贸易

马绢贸易是双方统治阶级约定的官方商业交往。回鹘汗国每次由可汗派使者前往唐朝交易换取马价绢。除可汗外,回鹘汗国的贵族也凭个人

收稿日期:2011-01-16

作者简介:刘正江(1974-),男,四川内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北方民族研究。

身份直接与唐朝进行贸易。派往唐朝的使者大多兼做买卖。因为直接参加出使的人可以得到好处,所以每次出使唐朝的使团人数众多,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有时私人贸易量并不亚于官方贸易量。药罗葛灵便是一例。792年7月,回鹘可汗的养子药罗葛灵趁来唐朝觐之便,“市马绢七万匹”<sup>[3]5210</sup>。当回鹘汗权衰微时,回鹘贵族也通过马绢贸易取得唐的支持<sup>[5]</sup>。出使回鹘汗国的唐朝使臣利用册封、和亲的机会与回鹘进行贸易。唐朝使臣大多私自用绢与回鹘换马以取利。“贞元中,诏以咸安公主降回鹘,[赵]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为副。前后使回纥者,多私赉缯絮,蕃中市马回以规利,独憬一无所市,人叹美之。”<sup>[3]3629</sup>这里赵憬没有进行绢马贸易反倒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受到公众的赞扬。可见当时人人争相与回鹘换马以谋利。唐朝大臣的俸禄与犒赏都是用丝绸支付的,多余的丝绸用来与回鹘进行绢马贸易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纵观回鹘汗国与唐朝的交往,马绢贸易是以官方贸易为主要形式,通过官方贸易这种稳定的贸易渠道,回纥换回了大量的丝织品,发展了国内的贸易经济,但私人贸易也是对官方贸易的一种重要补充。

#### (四) 回鹘与唐朝马绢贸易存在的问题

在马绢互市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回鹘输来的马匹数量规模日趋扩大,后来竟出现了唐朝不堪重负,无力支付高额马价绢的局面。回鹘输送的马越多,唐朝欠的马价绢就越多。唐朝一次付不了如此众多的绢匹,只得削减回鹘交易的马匹数量。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回鹘贵族赤心领1万匹马到唐朝进行贸易,此时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财力匮乏,根本拿不出过多的绢帛给赤心。朝廷官员建议只交易1000匹马。郭子仪因以“回纥前后立功,不宜阻意,请自纳一年俸物,充回纥马价”<sup>[3]3464</sup>,虽然代宗没有答应,但仍“命市六千匹”<sup>[12]</sup>。此时的马绢贸易已成为朝野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主题。总的来说,唐朝的绢帛不足是限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价过高是限制贸易发展的另一原因。回鹘一匹马换唐绢四十或五十匹。白居易在《阴山道》中曾抱怨“五十匹缣易一马,缣去马来无了日……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sup>[6]7224</sup>一方面是回鹘为了商业利益千方百计与唐朝市

马,另一方面唐朝迫于压力要给回鹘马价绢。马绢贸易已经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它脱离了原本的商品价值规律。发展到最后,就是回鹘来中原换绢的所谓骏马其实不过是一些又老又瘦的羸马,很难派得上用场,至于上战场那更是不可想象的。尽管马的质量实在令人失望,每岁死伤十之六七,但回鹘仍要求五十匹缣易一匹。早被战争拖得奄奄一息的李唐王朝无力承担这高昂的买马钱,人民困苦不堪,怨声载道,唯有“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来应对马与绢之间的矛盾。回鹘人得到这些粗制滥造的绢也无用处,常埋怨唐绢尺寸不够而质料又坏,“诉称无用处”。

#### 二、马绢贸易对回鹘的影响

唐与回鹘的关系的重要表现在于双方的经济联系,马绢贸易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它为双方各取所需提供了平台,同时也给回鹘汗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各种影响。

##### (一) 影响到回鹘汗国的对唐政策

因回鹘汗国内有数量众多的善于经商的粟特商人在操纵干涉国内的政治,使得回鹘对唐朝马价绢的依赖性更强。得利的回鹘贵族严重依赖马价绢来维持其统治。最显著的一个事例就是唐德宗时期的“突董被杀事件”。779年,漠北回鹘汗国在九姓胡的唆使下,欲趁德宗初立,唐政局不稳之机,图谋举国南掠唐朝。宰相顿莫贺达干劝阻,可汗不听。于是,次年,顿莫贺达干利用大多数人不愿进攻唐朝的心理发动政变,自立为汗。顿莫贺自立后即派使臣请求唐朝册封,唐派京兆少尹休源为使者,前去漠北册封。当休源还在路上时,唐振武军留后张光晟在德宗的授意下杀了准备回国的回鹘使者突董等九百人,突董是顿莫贺的叔父。这一事件显然对回鹘与唐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当休源到达回鹘汗廷时,顿莫贺并没有以牙还牙杀休源,而是采取了不见唐使,派他的大相颉干伽斯严厉斥责了休源一番并将他放回。这一做法非常反常。但从顿莫贺派人传给休源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原因“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唐负我马直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sup>[6]7330</sup>同时顿莫贺派粟特人康赤心为使随同休源一同回唐索要马价绢而没有再提突董被杀之事。最后唐付给回鹘绢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得以平息这场可能导致战争的危机。从顿莫贺不杀

唐使的原因分析,此时回鹘汗国对唐朝的经济依赖已经加深,贸易收入是维持汗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再加之粟特人在汗国政治上的影响,所以顿莫贺从整个汗国的经济利益出发,采取了一种非比寻常的做法。大宗的马绢贸易,回鹘人及在回鹘的粟特人都很需要。可以说经济利益左右了汗国与唐朝的关系走向,是战是和都取决于马绢交易。在这一时期,由于吐蕃的强大,对回鹘和唐朝均造成了重要的威胁,回鹘需要唐朝这样一个经济上互补的伙伴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以抵御吐蕃,维护其在东西方贸易上的既得利益。即使唐朝有时输送给回鹘的一些绢帛粗陋不堪,但也无妨大局,这并不能打消回鹘人对马绢贸易的积极性。这一切都取决于回鹘人从马绢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实惠。

(二) 回鹘人利用马绢贸易积累的资本涉足金融业(钱庄),干涉唐内政

马绢贸易对回鹘人最为有利,回鹘人从内地换回大量的绢帛,不仅用来满足自身需要,而且通过粟特人转运到中亚各地区销售。许多回鹘人经年在唐朝长安行商坐贾,经商致富,不少人成为唐人的债主。回鹘人继粟特人之后,凭借在马绢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开始进入唐朝长安金融钱庄业。9世纪前30年,回鹘人的财力之强已成为政治问题。某些回鹘钱庄的资产已达到甚至超过数百万贯钱之巨。他们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干涉中国内政,令一些中国高官情势岌岌可危。拥有大量资产的回鹘商人把钱贷给一些世爵官宦之家以及军人、商人和平民百姓供他们奢侈享受,回鹘人则收取高利贷。831年,非官方出现了一些小规模贸易往来,朝廷颁布法令禁止与回鹘人有钱财往来。等朝廷处理这一问题已是“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这年6月就有一典型案例:西平王晟之子李甚,因为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故贬李甚。于是下诏“自今以后,应诸色人以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其令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sup>[2]</sup>可见回鹘的金融业深入到当时长安各个阶层中,实力雄厚,影响较大。唐朝之所以要强调不得擅自与蕃客进行钱物交易,就是为了排斥回鹘对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干涉。但是随着回鹘人和

粟特人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回鹘人在中、东亚和西辽及蒙古人统治的元代的中国的金融业(钱庄)中涉足颇深。

(三) 影响到回鹘汗国的对外政策

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由于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大部被吐蕃占领,而藩镇割据又使唐政府的实际控制力相当小,无力顾及河西和西域地区。这样一来,由于吐蕃的入侵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这时唐朝西域守军与唐朝政府的信息往来以及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往都不得不改道,经由北庭,通过回鹘控制的“回鹘道”到达长安。安西、北庭因为不得不改道,所以被迫依附回鹘,以作自存之计。但是由于回鹘人“蕃性贪狠,征求无度,必强取之,人不聊生”<sup>[3]5257</sup>,激起了葛逻禄、白服突厥以及北庭附近的沙陀部落的反抗,葛逻禄、白服突厥勾结吐蕃共同进犯北庭。790年,吐蕃攻陷北庭,回鹘势力暂时退出了西域。东西方交通的阻断对回鹘的经济打击甚为沉重,回鹘因此失去了西域各部的赋税和过往商人的贸易税,尤其是对西方丝绸经营的垄断权。北庭的失陷对唐朝和回鹘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对唐朝来说也就是经营西域活动的结束,但对于回鹘来说则是断绝了与西方进行贸易的唯一通道。从唐中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克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致命弱点,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这是由于我国东南沿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许多不冻良港;海路能到达许多国家,通行自由,不易受陆路沿途各国限制;丝、瓷、茶等外销产品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沿海地区;海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可靠。所以西域丢失对唐朝来讲,经济上损失较小。对回鹘来说,则不然。显然回鹘争夺西域要比唐朝热心得多。791年,回鹘付出了巨大代价重新控制了北庭,恢复了北庭以东的交通。“当然它之所以维持这个要冲并不是为了唐朝,乃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sup>[8]27</sup>

(四) 马绢贸易促使回鹘汗国城市兴起,加剧了回鹘上层定居化的趋势

城市的发展说明商业贸易在回鹘汗国的经济生活方面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贸易需要有固定的聚居地贮藏货物和赚得的钱财。不同于游牧的畜牧业经济,牧民的财产就是动物,人和动物逐水草而迁徙。这时贸易的发展使人们原来的居住方式

和地点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过去居无定所的局面,开始建筑城市,逐步走向定居的社会。回鹘汗国不断修筑城池和宫室以供因贸易获利的一部分贵族和商人阶层使用。葛勒可汗时,粟特人与中国人在仙娥河旁建筑了一座富贵城<sup>[8]30</sup>。“自有功于唐,唐赐遣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sup>[6]7282</sup>这种城市化倾向一直持续到汗国破灭,甚至直到西迁时回鹘人已经离不开城市生活了。乌介可汗就屡次请求唐朝借给振武与天德二城居住<sup>[4]6131</sup>。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促使回鹘人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回鹘人因马绢贸易交易量巨大,需居住在固定的区域为这种经济生产方式服务。尤其是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后,粟特人进入汗国的领导层。在汗国的庇护下,他们在中国的商贸活动不断扩展。一部分回鹘贵族受粟特社团的影响,开始了定居生活,这在翰耳朵城尤为突出。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他们的生活方式由原来的游牧放养型转变为城市定居型,交易的货币化是其必然结果。翰耳朵城与长安和洛阳两市的商贸往来逐年递增。回鹘人开始时大量使用唐朝的开元通宝,牟羽可汗时才发行第一种汗国钱币。钱币的使用证明有巨大马绢贸易量的存在,这种存在又促使回鹘人必须要有固定的城市开展钱币铸造业。经济生产方式的贸易化使回鹘人长期随水草而居的生活状态向城市化转变,逐步走向定居的社会。

### 三、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的实质

双方交易中的马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这是唐政府与回鹘共同确定的一个固定的官方价格,唐朝没有权力进行单独调整。当时马绢 1:40 的比价,严重背离了商品的价值规律。然而其却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而非正常的商品交易行为。长达 7 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局面,骁勇剽悍的回鹘曾经应邀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在收拾残局过程中建立了功勋;吐蕃曾经占领西北广大地区并且曾一度占领了唐朝国都长安,回鹘同样有为朝廷解围之功。因此,唐朝与回鹘的互市,远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在内。北方民族与唐的马绢贸易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其实唐初与突厥市马就已经意识到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忧虑,唐高祖起兵太原,

曾言“蕃人未是念须胡马,待之如渴”,及突厥以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义士咸自出物,清悉买之;帝曰“彼马如羊,方来不已,吾恐尔辈不能买之。胡人贪利,无厌其欲,少买且以见贪”<sup>[9]</sup>;寥寥数语,乃恰道着中唐以后市马之困苦。贞观年间,鉴于国初马匹之短缺,沿袭了隋朝在西北牧马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高宗时,马匹已经达到七十万六千匹,必须不断开辟新的牧场才能容纳得下这么多马匹。当时马价非常便宜,马一匹才值一缗,是为马价最贱时期。马不值钱,马粪倒是能卖个好价钱。“高宗时卖苑中马粪,犹得甘万缗之。”<sup>[10]</sup>可见当时马匹之多,马价之廉。在和平年代里,马是派不上用场的。安史之乱稍后,唐朝牧马的秦、渭、兰、原四州于广德初都陷吐蕃,牧场尽失,故永泰元年吐蕃入寇,有诏大援马。唐朝被迫向回鹘购买马匹,购买之经济损失,言之最痛切者莫如白居易云“五十匹缗易一马,缗去马来无了日……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值。……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

如果单从经济上考虑,还不能全面理解回鹘与唐朝的马绢贸易。唐在军事上也需要回鹘马,马匹作为战争物资必不可少。每当战争爆发,唐也要主动向回鹘购买马匹。787 年,李皋为对抗吴少诚即“市回鹘马益骑兵,尝大败以教士,少诚惮之”<sup>[3]3640</sup>。816 年,唐讨伐藩镇吴元济,因缺战马,“命中使以绢万匹,市马于河曲”<sup>[11]</sup>。与回鹘市马,弥补了唐朝战略物资的不足。中后期的唐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外部是“来如飘风,去如骤雨”的吐蕃骑兵;内部是独霸一方的藩镇割据。无论对内对外都刻不容缓地需要马匹充实军队以加强实力。因为马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强大的战略性武器,它既是装备骑兵必不可少的物资,同时也是军队运输、传送情报的最好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买回鹘的马匹充实军用就是最有效的防卫措施了。

唐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考虑与回鹘的贸易。回鹘过多地将马匹输入唐朝是唐统治阶层不愿看到的事,因为这样可能会加大国内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矛盾;但是如果回鹘不与唐朝进行马绢贸易,又会导致唐政府担心其周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离它而去或过于强大成为外患,这也是唐统治阶层不愿看到的事。李绹的一番话道出了唐

政府在马绢贸易方面的两难处境。李绛言“回鹘盛疆,北边空虚,一为风尘,则弱卒非抗敌之夫。北狄贪没,唯利是视,比进马规直,再岁不至,岂厌缁帛利哉?殆欲风高马肥,而肆侵轶。故外攘内备,必烦朝廷。……北狄西戎素相攻,故边五虞。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戢战,边人拱手受祸。”<sup>[4]6126-7</sup>李绛的认识比白居易更高一筹,不是单纯地从经济上考虑得失而是站在政治的高度认识马绢贸易;他认为唐政府与回鹘市马不仅增强本身的军力,同时削弱周边少数民族贵族的军事力量;他把唐政府对回鹘的绢马贸易视为一种有效的羁縻手段,用绢马贸易牵制回鹘,使回鹘依赖于唐朝,牵制它的因素越多就越能控制它,以此获得唐朝北部边疆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把回鹘作为抵御吐蕃的屏障,政治上的获益相比经济上受到的损失显然要大得多。

唐与周边政权的联合首选回鹘,因为它与唐比邻相伴,拥有唐所需要的马匹,并且在关键时刻总能出兵解救唐朝,所以李泌献计给德宗“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sup>[6]7502</sup>与回鹘和好不仅可以牵制吐蕃,而且还无北边之忧。正因为如此,唐王朝对于回鹘总是有求必应,既要满足其提出的互市要求,又不能在马绢贸易中坚持合理的比价。唐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能与回鹘实现和好,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长期与回鹘维持马绢贸易。而对于回鹘来说,与

唐和好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从中原源源不断地获取绢帛等物。唐利用经济手段将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在马绢贸易中付出了直接的经济代价,但是却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不仅达到了其羁縻统治的政治目的,而且也达到了有利于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弗朗索瓦·蒂埃里. 论中国及粟特对突厥社会货币的影响(公元6—9世纪)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G].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43.
- [2]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G].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1727.
- [3]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 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李德裕.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09.
- [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古籍出版社, 1956.
- [7] 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45.
- [8] 冯家升. 程溯洛, 穆广文.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G].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58.
- [9] 温大雅. 大唐创业起居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8~11.
- [10] 岑仲勉. 隋唐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300.
- [11] 王溥. 唐会要[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121.

[责任编辑 张松]

## Silk and horse trading between Ujur and Tang dynasty and the essence of it

LIU Zheng - jiang

( College of Language , Xinjiang University , Urumchi 830046 ,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middle - Tang dynasty , Ujur became a strong minority regim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ng dynasty. In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ang dynasty during a hundred years , the silk and horse trading wa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xchange between Ujur and Tang dynasty ,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uch trade for a long time involved in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both Ujur and Tang dynasty. The silk - horse trade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jur w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ang dynasty's implementing of Jimi policy.

**Key words:** Ujur; Tang dynasty; silk - horse trade